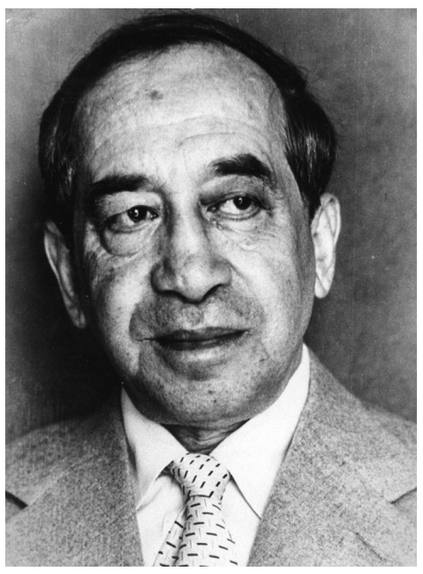
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环球史话

克拉考尔：魏玛时代的先行者

□ 林雅华



克拉考尔展开思考的时代

魏玛时期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激荡的年代之一。它处于一战溃败到民主制度初创，以及不久之后纳粹崛起的交界点上。从政治上看，孱弱的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之初就遭受内忧外患；经济上，虽有道威斯计划的援助免于一劫，但最终无法抵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震荡；文化上被纳入了美国式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链条，却仍旧无法逃避意义重构的危机。一战的溃败与经济的破产，导致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倒向了以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悲观主义。而美国大众文化工业产品的倾销，则导致普通民众倒向了对资本主义片面理性的追捧。和平与动荡、复兴与幻灭、丰富与匮乏，在这个先天不足的共和政体中轮番上阵。没有任何一种整合力量，能够为民众带来真实、持久、稳定的支持，以弥补信仰空间的缺失，以及对深层次意义的渴望。

在这样一个混杂多元的思想史语境中，一位时代的先行者，时任《法兰克福报》编辑的克拉考尔，对魏玛文化的困境进行了独到的诊断。他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德国经历了物质的巨大进步。但其内在，却无法跟上这一高速发展的脚步……灵魂最要紧的需求，已经支离破碎，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活生生的并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仰，来表达我们的本质。”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魏玛时期依托理性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进程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人的生存提供真实意义的价值信仰是否能够得以重建？

克拉考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克拉考尔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其所进行的解读，克拉考尔构建出了一套以“去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为核心观念的历史哲学话语。他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曾经依靠神话以及各种宗教神学话语，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并确证自身在天地间的位置。强大的自然力一度被收编为人所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神话以及神学话语逐渐固化，成为了外在于人类力量的绝对性存在，使得人类丧失了把握世界的主体性地位。近代以来，启蒙理性跃上历史舞台，将拆解各种各样的神话链条作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也在此意义上，与统摄神话世界的自然力展开了对抗。

因此，在克拉考尔看来，这样一个“去神话化”的过程，意即神话与绝对性的衰落，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但是，这绝非终结之环。因为，光是把人类从自然神话的控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还远远不够。理性的任务还应该是，为这个世界重新带来意义。也就是说，理性不仅仅应当承担起打碎神话链条，释放人类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历史性功用，还应当为这个已经丧失了统一性的碎片化的现代世界，重新赋予可以信靠的真理。因此，“去神话化”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环节，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而远非最后的结局。

不幸的是，在理性击溃原有的神话体系、信仰体系之后，世界却被充斥着抽象性的资本主义理性所掌控。它完全沉迷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放弃了追求真理的动力与革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受到理性之启蒙而觉醒的“人”，并没有真正得以解放，而是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变成了一个个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力的职业化的机械部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往往被职业的惯性所束缚，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已经放弃了去思考、去批判的权利，只剩下对职业机械化的盲从。因此，现代个体依旧处于一种本质上完全疏离的状态，无法实现内在心灵结构的整合。就此而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其实都是虚假的。从表面上看，现代社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拥有更加丰富的知识，更加高效率的生产。但是，当知识和生产被无限扩展之后，人类自身的情感与存在的渴求却被彻底忽略了。甚至，个人根本就无法意识到自身彻底的空虚和无意义。正像克拉考尔所提到的：“其中完全缺乏的，是一种根植于共同体基础上的整合形式，这种对共同体、对友情、对内心生活的充实，对个体人格实现的憧憬，通通只是无法实现的渴望。”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在理性化的工作链条中丧失了独有的本性，被对象化，被物化了，即“在意义散佚之后，人的被对象化”。

克拉考尔认为，以抽象性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理性，必须要为这一现代性症候负责。抽象性，是资本主义时代技术理性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产物。作为科学思维的胜利成果，它代表的是理智对抗自然力的胜利。尽管抽象能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对其寄予太大的希望。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用以理解和控制世界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对于整个世界“意义的丧失”这一根本问题，资本主义和科学无法提供任何出路。他们所创造的以客观性和抽象原理为基础的现代生产体系，没有考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和原则。人在这个体系中已经完全被降低为一种数量关系和一种非人的原则。正是由于抽象、片面的资本主义理性的盛行，才导致人们日益迷失在机械化知识所构成的海洋，而最终丧失了对具体性的追求，同时也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当然，克拉考尔的这一充满智慧和启发性的论断不应被误读。他对资本主义或者对片面理性、技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去倡导一种幼稚的浪漫主义回归，而是希望人们不要一味沉迷于资本主义合理性所带来的空洞进步，却停止了追求真理的脚步。

如何走出现代性困境

那么，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性困境，重新获取真实的意义呢？克拉考尔在《大众装饰》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阐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无可挽回地变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碎片境地，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整体性的东西存在了。但是在这其中还存在一些机会，能够发掘意义留下的痕迹。”这些可能的机会与意义的留痕究竟在哪里？回顾克拉考尔的历史哲学，我们知道，在他那里，“去神话化”的过程一方面指代了理性对抗自然力的胜利，另一方面又指代了必须要克服资本主义理性对抽象性的极度崇拜，警惕其所引发的“再度神话化”。因此，如果想要重新激活理性的革命性力量，继续开启理性的历史性任务，重新为这个世界与人的生存带来真实的意义，必须要向资本主义时代的抽象理性开战。要想与之对抗，就必须倡导一种完全与之对立的具体化，或者说唯物主义化的观察视角。

他借助《法兰克福报》这个平台，跃入了魏玛共和国的时代激流——对各个不同领域尤其是隐藏在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诸多“表面现象”，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对他来说，只有这些沉落在具体社会现实中的物质性存在，才是探查现代世界之内在“宫殿”的重要线索。这些物质现实及其文化表达，一方面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真实面相，另一方面则提供了探查这一时代之隐秘逻辑的可能——在其无所不在的现实烛照中，资本主义世界中貌似严丝合缝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暗藏的种种裂痕，都将被一一加以呈现。依靠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的理性批判能力，就能从这些现实的裂缝处，直接探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深层次结构，进而把握失落的真实意义之踪迹。

“有脚阳春”宋璟

□ 陈　良



宋璟，是与姚崇齐名的唐代开元时期贤相（史称“姚宋”）。

宋璟自幼好学，博学多才，十七岁进士及第。武则天时期，历任上党尉、监察御史、凤阁舍人、御史中丞等职。由于“居官鲠正”，得到武则天的赏识。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诬陷宰相魏元忠，贿赂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看在他是女皇“红人”的份上，张说违心答应了。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闻知此事，便告诫张说道：“人生在世名节至关重要，不可陷诬好人以苟且偷安。魏大人即使被谪官流放，他的美德仍旧散发芳香。如若他有不测之祸，我将上大殿为他申诉；大不了，咱们一起去死。”张说被宋璟一番话所打动，廷辩时如实对答，使魏元忠免受陷害。

一般来说，凡是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人，大都很冷峻，甚至铁面无情。而宋璟曾为地方官，每到一处，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办好事，故而被人们称为“有脚阳春”，比喻他像长了脚的春天，无论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可见，宋璟既有冰冷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不过，他的铁面无情，主要针对为非作歹的权贵；他的温暖如春，则是面对普通的平民百姓。

宋璟虽在睿宗朝做过宰相，但成就他贤相美名的却是开元时期。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因故退隐，推荐宋璟接任。宋璟随即调返京师，任刑部尚书；不久，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史书称赞：“（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的确，宋璟善于用人，注重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是他提出并坚守的基本原则。

宋元超是宋璟的叔父，他曾向吏部打出宋璟的招牌，希望在选拔上受到优待。宋璟闻知此事，立即给吏部发文书说：“宋元超是我的三从叔，因他常住洛阳，彼此很少参见。我既不因他是长辈为之隐瞒，又不愿以私害公。假如他没说这层关系，吏部可以照章办事，而今既然声张出来了，就必须矫枉过正，请不要录用他。”最可贵的是，宋璟还恢复了贞观时期的旧制；凡是百官奏事，必须有谏官、史官在场。这是唐太宗制定的好规矩，能有效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搬弄是非。唐高宗时期，许敬宗、李义府用事，破坏了这规矩，带来了不少弊病。此规矩重新施行，加上宋璟奉公守法，选贤任能，使得当时政治颇为清明。

严明吏治，往往离不开反腐败。为此，宋璟极力革除一些陈规陋习。当时流行潜规则，地方长官每年定期派使者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往往携带大量珍贵宝货进京，以便四处送礼，拜结权贵；这样一箭双雕，既有利于地方长官获得好评，又有利于使者本人晋升。宋璟对此很反感，奏请玄宗同意，勒令官员收受礼物一概退回，并要求下不为例，从而杜绝侥幸上进之路，削杀送礼贿赂风气。与此同时，宋璟还严肃惩治一批有问题官员，不允许他们妄诉狡辩，全部交付御史台查办。除了整饬官场，宋璟还整顿市场，禁止劣币（当时叫“恶钱”）流通，因而得罪了不少权贵。

开元八年（720年），遇到长久干旱，权贵借题发挥，指使优人在为皇帝演戏时为三百名违法官员喊冤叫屈，将旱情归咎于宰相。为此，宋璟被罢免宰相职务，降为开府仪同三司。不过，玄宗仍敬重宋璟，重大案件交他审理，关键时刻向他问计。此后，宋璟又兼任吏部尚书，并于开元十七年出任尚书右丞相；四年后致仕，隐居洛阳，再过四年去世。

有道是，无欲则刚。宋璟的刚直，就是因为他公正无私，淡泊名利。宋璟曾任广州都督，当地人原先习惯以竹木茅草盖房子，时常失火，于是宋璟教他们以砖瓦建造房屋，既舒适合用，又能避免火灾。鉴于宋璟为民众办了很多好事，广州百姓在他离任之后，自发捐款为他修建遗爱碑。已经出任宰相的宋璟听说此事，立即求见玄宗皇帝，对玄宗说：“立碑是为了传颂功德。臣在广州的治绩不值得传颂，如今臣位居宰辅，故而有人张罗给臣立碑，那些溢美之词似有阿谀嫌疑。立碑不可取，此风不可长，请陛下下诏禁止为官员立碑，首先从我开始。”玄宗同意发布禁令，此后各地不再有人为官员立碑了。

古代廉臣

李世民的信任

□ 游宇明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四月，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不顾众人反对，任命尉迟恭为右一朝统军。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担心尉迟恭反叛，劝李世民将其诛杀，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年七月，李世民奉命率军东征洛阳守将王世充。九月，当时已投降唐王朝的军阀刘武周的部将纷纷反水，唐朝一些将领担心尉迟恭也有同样的心思，将他关押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兵部尚书殷开山建议李世民将尉迟恭杀掉，李世民再次拒绝了，还当场释放尉迟恭，并引入内室，赐以金银宝物。李世民对尉迟恭说：“大丈夫凭着感情志向互相信赖，请不要将小小委屈放在心上。我不会听信谗言迫害忠臣良将。如果你认为应该离开，我现在就用这些东西资助你，以表达我们短暂共事的情谊。”尉迟恭没有走，表示自己一定会留在军中效力。

唐朝一些将领对尉迟恭高度不信任，不是没有原因的。在降唐之前，尉迟恭（尉迟敬德）的经历颇为复杂。他少年时打过铁，后来参加讨伐农民起义的官军，这个人天生是个打仗的料，在战场上总是不顾安危冲锋陷阵。从军不久，就做上了隋朝的朝散大夫。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叛隋，杀死马邑太守，遣使归附突厥，据郡城称帝，建元天兴。他闻知尉迟恭作战勇猛，千方百计将其网罗到自己麾下，任命其为偏将。李渊建唐后，刘武周与之争胜，尉迟恭也因此成为唐朝的敌人。刘武周没有错看尉迟恭，此人打仗真的特别厉害。武德二年（619年）九月攻克晋州，十月攻占浍州。此时，夏县人吕崇茂起兵响应刘武周，遭唐重兵围剿，尉迟恭领兵救援，大破永安王李孝基，生擒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行军总管刘世让。后来，刘武周、宋金刚等人因为兵败被突厥贵族所杀，天兴朝群雁无首，李世民派人劝降尉迟恭，尉迟恭才以介休、永安两城心不甘情不愿地降唐。

李世民毫无保留的信任深深激发了尉迟恭的报恩之心。就在赐金的当天，李世民亲率五百骑兵巡视战场，行至魏宣武帝陵（今河南洛阳市北邙山）时，突然被王世充率领的万余骑兵包围。王世充部将单雄信挺槊直逼李世民。在此危机时刻，尉迟恭跃马一呼，横刺单雄信坠马。接着，尉迟恭又将李世民挡在身后，缓缓撤出了包围圈。随后，尉迟恭又率骑兵突入王世充部，活捉其部将陈世略，斩首千首级，俘虏六千人，王世充只身逃脱。

某次，尉迟恭随李世民率五百骑兵侦察窦建德部军营，突遇窦军游骑，游骑开始还以为他们是自己人，李世民突然大喊：“我是秦王！”随后挽弓射杀一将。窦军大惊，立即出动六千骑兵相追。尉迟恭保护李世民且战且退。每当追兵将要赶上时，即开弓射击，每射必杀一人，窦军大惊，气势越来越弱。最后李世民和尉迟恭将窦军引进自己的伏击圈，让窦军吃了一次大亏。

信任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不难信任亲人，亲人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打断骨血连着筋，你好大家都好，你不好大家都受损。我们也常常会信任知己。知己者，心心相印也，他们的操守怎样，他们的价值观如何，你一清二楚，信任他们，你肯定不会遭到背叛。信任陌生人会相对难一些。陌生人就是从未打过交道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为人处事，不清楚他的所思所想，在他们面前，我们会担心交浅言深、害怕谬托知己。比信任陌生人更难的，是像李世民一样信任曾经的“敌人”。曾经的“敌人”对问题的看法与自己不一样，做事的思路相异，他们甚至对我们的利益造成过重大损害，也不知此刻他们是否真的愿意跟我们同心同德。信任这样的人既需要气度，更需要胆量。

然而，信任曾经“敌人”的价值也正在这里。我们信任亲人、知己，他们也会高兴，也可能付出回报，但这种回报不存在太强的情感冲动。曾经的“敌人”不一样，因为曾经尖锐对立，他们对你没有过高的期望，能够让其不受干扰地正常生活，他们已经觉得你大度；能让他们参与你正在做的事业，他们会认为你开通；如果能像李世民一样，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真正信任他们，他们自然会无比感激，必然会千方百计回报你，以此证明你没有看错他。可以说，对曾经“敌人”的信任，是所有信任中难度最大的，也是所有信任中“回报率”最高的。

史镜

有所思

明代吏治之失

□ 徐　佳

明朝灭亡之后，在读书人普遍沉浸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冷静下来，认真反思和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亲眼目睹了明代的灭亡，熟悉明代制度和史实，对晚明吏治的败坏有着切肤之痛，作为明朝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思值得后人深思。

顾炎武分析明末吏治腐败原因的时候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明代官俸的确微薄，一个正七品知县一年的工资是90石粮食，由于粮食常常短缺，还不能完全发粮食，只能发12石粮食、27两银子和360贯钞，晚明纸币贬值，360贯钞票连1石大米都买不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赶上运气不好，银子也被折合成胡椒之类的东西，需要官员自己拿到市场上卖掉。

这就造成了明代清廉自守的官员生活非常困难。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明初一个名叫曾秉正的正三品的通政使，卸任的时候，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把自己的四岁女儿卖掉才凑齐路费。而最可怕的是，这个标准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二百多年过去了，不管物价怎么涨，工资还是纹丝不动。正统六年，监察御史曹泰上了一个奏折，分析了官员合法收支情况，指出工资根本不够官员养家糊口，希望“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其仍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则贪风息矣”。洋洋洒洒几千字，中心思想就三个字：涨工资，结果，朝廷也批了三个字：“遵祖制”。一方面，朝廷发的合法工资很低，另一方面，朝廷对官员“擦边球”的隐形收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就导致了“常例钱”等官场陋规盛行，恶化了官场生态。

王夫之反思明代州县吏治的时候，说“胥吏威行于郡邑”。明代官员的工资低，但好歹还有工资，州县的胥吏，很多连工资都没有，只能领到一点点生活费，而且胥吏的政治地位很低，胥吏的子弟连科举都不能参加。但是，很多人挤破头都想到衙门里谋个差事，当然不是为朝廷当差、为百姓服务的政治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有利可图。“儒官初任，政未谙练，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州县长官大多数是科举出身，人生的大多数时光都耗费在四书五经和吟诗作文上了，对衙门事务并不熟悉，甚至不屑关注，于是衙门里的大小事务都由胥吏经手和把持。他们利用各种文书、诉讼、征粮的机会，大量收受贿赂，再用一部分赃款贿赂上司，这就加剧了州县吏治的败坏。

总的来说，明代吏治思想与制度，在古代算是比较完善的，学者钱穆对此评价道：“故明之吏治，且驾唐、宋而上之，几有两汉之风。”反思历史，明代吏治制度之严密，腐败速度之迅速，都是超乎想象的，其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也都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

清承明制，吏治制度无大改观，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直到清末，对吏治制度的探讨才有了新的视角，比如梁启超指出：“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对“民权”的强调，是对数百年前朱元璋强化“君权”的历史呼应，这一呼应，跨越了明清两代，穿越了数百年的历史烟云。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永恒的吏治课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艰巨的历史使命。